



记忆中的宽银幕电影院

彭庆东

2000年,我在太原市粮食局二库(太原面粉二厂)工作。年末,上级发来计划调度指令,要求我们接收小麦1万吨,代为储存保管。

时间紧,任务急。我们立即召集储运部门着手准备,进行腾仓并库,拿出最好的库房储存上级调入的小麦。上级安排小麦储存在太原,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布局,也对我市粮食应急救援发挥着后盾保障作用。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收益,提高职工的劳动和仓储效率,增加职工收入。

储运科长王占威和粮食保管员一个粮仓一个粮仓地摸底,最后选出两个粮仓储存上级调入的小麦,仓里的小麦集并到其他负荷不满的粮仓。仓房腾出来了,消毒杀虫,清理干净,再反复测量,发现如果采用麻袋包装储存,容积量不够,散装则怕墙体承受不住。大家群策群力,提出了围包散装的储粮办法。就是库房挨墙处用麻袋包装的小麦砌成梯形墙体,里面放上散装小麦,这样减少墙体压力,同时可提高30%左右的仓容量,储存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刚过春节,职工们还沉浸在节日氛围之中,太原火车站发来通知,上级调入的小麦已到东站,小麦列车通过专用铁道线马上陆续进入粮库,并限定期限卸火车,否则罚款。第一天推进了十几节车皮,装卸工卸了不到一半。第二天仍然没完成卸车计划,火车站就发来了催卸通知单。每个车皮60吨小麦,共160多节车皮,时间紧,任务急,按部就班已不可能完成卸车任务,不仅面临火车站罚款,也面临着储备粮因卸车进度慢而调入其他粮库的可能性。

我们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动员还在放假的中层干部和机关后勤人员参战。大家非常踊跃,第二天就全部上班。1袋小麦80公斤,我们这些平时坐办公室的扛一袋也很费劲,还要扛到十几米外打垛。装卸工两人卸一个车皮,一人在车厢往门口搬运小麦,一人在下面扛上小麦起垛,一天能卸两车皮。机关后勤人员是力量不够人来凑,每个车皮上10个人。一会儿,我们的衬衣就湿透了,凉风一吹,就打个寒颤,一天也只能卸一个车皮。虽然我有当农民、工人的“底子”,一天下来也是筋疲力尽。

这样的速度仍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正当发愁之际,车间主任王玉琨主动请缨:“春节后是粮食生产的淡季,让工人先卸车皮吧。”真是雪中送炭啊,就这样增添了生力军。后来,男职工都来卸火车,女职工送水,做好后勤保障。

职工们齐心协力,不分工种,不分干部职工,全部上阵,就这样坚持苦干十来天,圆满完成了小麦接收任务。

宽银幕,是指位于太原市解放北路与钟楼街、西羊市街十字路口西南边上的宽银幕电影院,这是老太原人对这家电影院的昵称。儿时的我就听说太原有个宽银幕,到那儿看电影与别的地方不一样,需要戴眼镜,那个感觉妥妥的就是“身临其境”,但那儿票价可要比一般电影院贵得多,能看一部宽银幕,算是一回奢侈的享受。

在那个没有电视、手机、网络的年代,电影院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化圣殿,看电影就是最好的娱乐方式。而太原宽银幕电影院又是太原市乃至全省第一家也是唯一放映宽银幕电影的电影院,它于1960年元旦正式开放。当时它的建筑外形及宽银幕一下子就成了太原市的又一重要地标,吸引着全市的影迷观众,就连外地人也要来此开眼“尝鲜”。那时,从我家往东走200米向南便是解放电影院,我隔上个把月还能享受一场5分钱的学生电影票,但仍顶不住宽银幕对我的诱惑。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元宵节,我和父母、弟弟沿着解放路向南边走边看灯,不知不觉来到了宽银幕,我们便吵着要“开荤”。于是,爸妈只好为我们买了票。入场时,这才看到要戴的那个眼镜是软塑料的,镜片呈红绿色,犹如儿童玩具。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嘱咐散场后再交回来,并特意告诉我们这是立体电影,那时还没有“3D”这个词,如果不戴这个眼镜,看电影会是重影子。记得

那时上演的一部立体电影叫《魔术师的奇遇》,还是彩色的,主演是陈佩斯的老爸陈强,剧情记不太清了。只感觉到上面的人物、动物都不像是在银幕上,就像在你眼前似的,很紧张刺激,如陈强的钓鱼竿伸向银幕,从镜头外钓了一条大鱼,仿佛是从观众头上钓出来的;火车进站,会感觉到车轮从你的头顶上碾过。电影放映的时间不长,当我从电影院出来后,感觉到眼睛疲劳甚至头昏脑涨,此后才知道为什么立体电影的放映时间都不会太长。

以后每年的元宵节,我又多了一项娱乐活动,先看灯后看宽银幕电影。

宽银幕电影院不仅里面的宽银幕吸引人,门前还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小集市,只要有电影放映,总是门庭若市,不仅来看电影的人川流不息,做小买卖的更是五花八门,叫卖声不断,有脖子上挂着木制小箱子的烟贩,上下两层摆满了哈德门、大三巴等档次不同的香烟,还可以拆盒零售;有手提小杆秤卖五香瓜子的小贩,将称好的瓜子装在废旧报纸折叠成的漏斗状

纸袋里,卖给情侣们看电影时“闲嗑”;有摆小人书地摊的,花个一两分钱可以看一本小人书;还有卖影星剧照明信片的,也是抢手货……

逢年过节,这里还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都市大舞台,许多票友们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唱念做打,也有著名晋剧艺术家登台清唱;还有闹红火的秧歌队来此助兴,庙前街高跷队就是从这里踩进了元宵节的街头巷尾。最主要的是,这儿还是仅次于五一广场的一个文化活动中心,每年的“五一”、国庆节等重大纪念游行表演等活动,从五一广场出发至大南门后,都要转向北表演到最后一站——宽银幕才结束,以此宣告着本次纪念活动的圆满成功。每一次,我都是早早地来到这儿,等着观看表演活动的“压轴戏”,小孩子们在这儿可以不受约束地与游行表演队伍“互动”。

如今,站在解放路十字路口处高高的人行天桥上,华灯初上的宽银幕别具风格,那一帧帧浮光掠影的老电影,依然在我脑海里闪现……



难忘时刻

感念母亲

李汝骥

夜深人静时,想起离世38年的母亲,我不禁潸然泪下……

1985年6月11日,我在山纺中学高中文科班上完语文课时,接到妹妹从天津发来的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我连夜乘火车赶回天津,径直来到医院的病房,妹妹悄悄告诉我:“母亲弥留很久,好像就是等你了。”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头,靠近她的耳边说:“妈,我回来了。”我似乎看到母亲在冥冥之中奇迹般地点头,就控制不住感情大声哭了起来。当晚我守候在病床上的母亲身旁,握着她瘦削的双手,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

母亲出生于1907年,生在一户贫苦人家,从未上过学,但凭着聪明好学,学得一手好针线,做得一手好饭菜。她嫁给父亲后,一生辛苦操劳,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哥哥上高中时就投身于学生运动,天津刚一解放,就参加解放军南下了。深明大义的母亲为哥

哥收拾好行装,送哥哥参了军。由于我家是军属,街道办事处每月发给一些生活补贴,母亲又承揽下糊火柴盒的营生,虽说生活十分拮据,但仍供姐姐、我和妹妹三个上学。1952年,我考上了天津百年老校铃铛阁中学,当时小学4个教学班200名学生只考上了我一个,录取名单还登在《天津日报》上。母亲喜极而泣,还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烙饼炒鸡蛋。上初中了,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件蓝布中山服上衣,我一直穿到高三,因生活艰苦,数年间母亲缝缝补补,几次加长,坐在我座位后的同学笑着对我说:“看见你衣服上密密麻麻的针线眼儿,我直眼晕。”母亲从小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1973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劳累,得了肺结核病,从太原回天津父母家养病。在母亲一日三餐精心调养下,病灶很快就硬结钙化了。告别母亲时,看到母亲双鬓白

发,我落泪了。返回太原后,我重新登上了高中语文课讲台,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后来我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

1985年6月13日,我回到天津后第二天母亲去世了,我们悲痛至极。料理完丧事,我回到了太原。从此我的书桌上就多了一张母亲的遗像,每当抬头看到母亲慈爱的面容时,就增添了努力工作的动力。第二年我教的文科班语文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学校给我发了一笔奖金,我全部寄给了妹妹,我们共同置办了一块墓地,把父母合葬了。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38年了,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的心,激励着我们向仁爱、善良、正直、勤俭的思想境界迈进,这是母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